

王桐龄●著

「上卷」

中國史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王桐齡●著

「上卷」

中國史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成一家之言

梁啟超題

風帟雲龍六偶然，斯人青史謨
連篇。中原代有英雄出，各苦生民
數十年。
于右任先生詩，

澤山先生命錄為大箸中國史卷頭言。

廿三年八月廿四日，吳興錢玄同敬題。



出版说明

以个人之力修中国通史而取得成就殊为不易。钱穆《国史大纲》和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是罕见的成功者。

王桐龄先生著《中国史》，洋洋一百二十多万言，叙述中国从远古到清末的历史，规模宏大，波澜壮阔，被梁启超称为“成一家之言”，可谓实至名归，可惜长期以来被埋没了。

该书第一个特点是鲜明浓郁的爱国史观，认为历史关系国家和民族的盛衰。作者强调：“国民爱国心发达则国兴，薄弱则国衰，绝无则国亡。历史者，爱国心之源泉，国民教育之基础也。历史教授之得法与否，与国家盛衰兴亡有直接关系。”他呼吁历史工作者要“注重我国国粹，考求立国之根本，国祚之绵延，历代先民之盛业，文化之由来，外交之关系。知我国为文明之古国，而思有以光大之；知我国现在为极贫极弱之国，而思有以补救之，养成一般中小学校学生之国民志操，以为救国之根本。”

第二个特点是独特的体例和结构。作者“最注意于民族之盛衰，国家之兴亡”，并以此为线索，贯穿全书，其历史分期颇有新意。他分中国历史为上古史、中古史、近古史和近世史四期，上古史为汉族胚胎时代，从神话传说到春秋战国；中古史为汉族全盛时代，从秦汉到隋唐；近古史为汉族衰微时代，从辽宋到元明；近世史为西力东渐时代，即清朝。

这种分期方法独树一帜，不但使中国历史变化发展的脉络赫然清晰，而且使中国历史立刻活了起来，几千年的盛衰兴亡，起伏转折，如大河奔流，波涛汹涌，尽现眼底。

第三个特点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。全书对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和历史人物成败得失的分析卓越而精辟，绝不人云亦云，以下略举数例。

在谈到国家疆域和统治时间长短时指出：“领土之广狭，与国家武力之强弱为正比例；国祚之修短，与主权者政治上的能力之大小为正比例。”

在总结秦衰亡原因时指出：“自来创业之主贵乎英断，守成之主贵乎仁慈……始皇帝以雄武之姿，席累世之业，并吞六国，行武断政治者十余年。其间干戈未尽息，创痍未尽复，教育未普及，实业未振兴，民生之凋敝如故，元气之摧残如故，虽法严令行，国内整齐

划一，顾民畏其威，不怀其德，仇视始皇者日益增加……嗣位之君主正宜大施仁政，删除苛法，休兵息民，以怀天下，庶几民望未尽去，宗社犹可保也。二世昏庸，虑不及此，为奸臣所愚弄，身死家奴手，国随以灭，可慨也。”

王莽篡汉历来为人诟病，作者却给出了同情的解释：“西汉亡国之直接原因，由于王莽篡立。莽之所以敢于篡立，且不能不篡立者，有二大原因：一为积极之原因，因为当时同姓诸侯势力微弱，不足以监督政府；一为消极之原因，因当时外戚势成骑虎，不篡汉室，恐遭灭族之祸也。”因为“外戚起于微贱，盗据国柄，权力愈大者，得罪于人民愈甚，其欲得而甘心者亦愈多。故一有可乘，动辄遭覆宗之祸也。王莽深悉此中利害，一旦得志，倒行逆施，略无顾忌，臣节固有亏矣，为个人计，固未为失策也。”紧接着，作者笔锋陡转，对王莽的失败提出尖锐的批评：“独惜其顽固迂阔，不切事情，朝廷举措，一则曰效法古人，再则曰占念符命，昧于当世之潮流与舆论之向背……驯至失天下，腐儒起家之奸雄，终不脱措大习气，所谓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，亦可笑也。”

同样是从历史人物所处具体情境出发，作者对秦桧也给出了不同流俗的评价：“由来主和者多小人，主战者多君子，人皆知之。然夷考当时国情，宋武力不如金者一，地势不如金者二，政局不如金者三。准此以观，当时宰相秦桧之主和，亦非择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然而当时书生昧于世界大势，动以尊主攘夷之说动人，秦桧久居异国，略谙敌情，及其当国，排群议而主和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及后世主持清议者多唾骂之，然而设身处地，为当时谋国计，固亦未可厚非也。”随后，作者也对高宗和秦桧贪恋权位，耽于宴乐，打击异己，不知卧薪尝胆，准备复仇，最终自毁长城表达了切齿之痛。

作者对脱离现实、不谙世事、泥于道德、激于意气的激进式书生议政、参政多所抨击。他认为“盖儒者之道，宽以待人，静以持己，操切手段与暴烈举动不能成事，反足以害事，君子所不取。”在谈到士大夫与东汉灭亡原因时指出：“盖叔季之世，大局已无可为，留此有用之身，犹可为全国社会，维持道德命脉于一线，为己身计，为国家计，为社会计，势固不得不尔也。东汉李杜诸贤，昧于斯义，热心国事，盲进不已，及其废黜，犹不自韬晦，反广通声气，批评朝政，有结党之嫌，有诽谤之迹，终以莫须有之狱为宦官所歼戮。虽灵帝昏庸，宦官绞狠有以致之乎，抑亦诸贤所自取也。”在谈到明朝后期士大夫的言论与政局时说：“明世士大夫好以意气用事，对于君主及宰相之举动，督责太严，丝毫不得假借。朝廷有大事起，不能酌理准情，婉言规劝，动辄呼朋引类，明目张胆，喧呼聒噪以争之，彰君主之失，明己之直，使君主老羞成怒，无转圜之余地，徒博一己之名，而于国事毫无裨益……甚矣狭义之程朱道学养成之八股先生，不足与语通权达变也。”

在比较了明太祖和汉高祖、唐太宗三位君主的成就之后，作者认为朱元璋“性情猜忌，果于杀戮，有汉高帝患得患失之心，无唐太宗长驾远驭之志。即位以后，大杀功臣，以

防异姓之跋扈,分封子弟,以固一家之势力。其结果则中国武力逐渐削弱,对外无发展势力之能力……中国坐拥十八行省土地,五六千万人民,日为小夷所侮辱,而不敢较,名为一统之大帝国,实则幅员之广,犹不及汉唐强盛时代之半。”

在分析清朝兴亡的原因时,作者以寥寥数语,做了精辟的概括:“清室之统一,大半由于侥幸,非清之实力能以亡明,明室君主之庸黯,宦官之恣横,大臣之泄沓,学者之迂阔,有以自取灭亡之道也。清室之衰亡,大半由于自取,非外人之力,亦非民党之力,能以亡清,清室君民之隔阂,上下之蒙蔽,满汉之倾轧,国家全体之麻木不仁,有以促成清室之亡也。”

此外,该书史料极丰富,对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、文化成就、风俗习惯均有涉猎,并附有大量表格,对许多重大事件等的叙述条分缕析,使读者一目了然。

《中国史》原书共分四编,均由北平文化学社印行。第一编于1926年出版,第二和第三编也于同年出版,第四编于1931年出版。

该书出版后,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到1934年,第一编五次再版,第二编四次再版,第三编三次再版,第四编二次再版。

此次再版该书,依据北平文化学社竖排繁体字版重新排印,除删除原书世系表和个别表格外,未加任何改动。

刘智峰

2007年6月5日

序

历代学术与政治 之交互的影响

游禹域、入燕京、登城门之高楼，近观殿阁之参差、远望川原之紫迥，怀古思今之慨，油然而生者何也，因其为同一土地，而为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及当代之国都；又足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汉族盛衰兴亡之迹故也。然同一土地，而阅历代之兴亡者，不独燕京！长安然，洛阳然，开封、江宁，亦莫不然！虽此等土地屡易国主，为中国几经革命易世应有之现象；而其间犹有通古今一贯之汉文化，能流传至于今日，不可谓非一大奇迹也！今试以各民族之盛衰兴亡为经、汉文化之消长变迁为纬，观察中国四千年之大势。

◎ 中国民族之中心

中国位于东亚大陆之一端，领有广大版图，其域内能容各种民族，又与周围之民族交涉关系常不绝者，固为当然之事；而由古及今，为各种民族之中心及文化之枢轴者，厥为汉族。约当西历纪元前二千年，汉族住居黄河流域之沃野，有总部落，有社会，其文化程度，似已较他族为优，黄帝、尧舜之事迹，属于传说区域，虽不敢断定其有无；而夏、殷二代，皆汉族建设之君主政体国家，当时各部落之酋长——即诸侯，皆割据一方，外民族之戎狄亦杂居内地，中央政府统一力一衰，诸侯专横，戎狄内侵之祸必起，移至演成革命。夏之衰也，诸侯中之殷起而代之；殷之衰也，诸侯中包有外民族之周起而代之。

◎ 周代文化之特色 管仲之功业

周朝继承其固有之文化，又融合夏殷传来之文化，组织一种新文化，遂呈郁郁乎发皇之观！语言为单音、文字为象形，富于敬天尊祖之思想；以家庭为社会之单位、以礼乐为教

化机关,维持君主政体,采用封建制度。周衰,统一之力弛、诸侯之专横、戎狄之侵入,相继而起。因而王室东迁,变为春秋时代。古来发达之汉文化,际此衰乱时期,几濒于破产之境。当时山东有一大英雄,名管仲者;相齐桓公,创立霸业,纠合小诸侯,抑制强诸侯,尊周室、攘夷狄,维持汉族之文化!孔子称其功曰:“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诚哉是言!其后强有力之诸侯,各假霸业为名,以自逞其野心,驯至酿成晋楚之争衡、吴越之迭兴,混乱纠纷,不可名状,遂渐变为战国时代。

◎ 春秋战国时代诸家学说纷起之原因及其影响

霸业最初之目的,原为救济国家与社会,其后霸者徒以争权夺利为事,不惟不能达救济之目的,反成为纷乱之祸源。又其救济之手段,专依赖政治的权力,未及于社会思想之根本问题,是为识者之遗憾。于是自春秋至战国,中间诸家之学说辈出;内容虽不一致,而多向根本问题,试行解决,则几为诸家之所同。其主要之学说,为儒家之仁义礼乐,墨家之兼爱节用,道家之虚无自然,法家之刑名法术,以上诸家皆未能统一思想界,其互立门户相竞争之情形,与战国七雄日以攻伐争战为事之形势同。当时秦人僻处西陲,杂居戎狄之间,据天然形胜,采用法家学说,以富国强兵,为内治之要具,以远交近攻,为对外之政策,着着努力于拓地殖民。关东诸国,或合纵,或连横,其国是常动摇不定,于是秦遂乘机陆续并吞六国,建立一统之大帝国。

◎ 秦始皇之统一政策

夏、殷及周初之中国,仅在黄河流域,及秦始包有扬子江流域。始皇帝废封建,设郡县,以图政权之统一,用法家学说,以图思想界之统一,其焚书坑儒,虽受后世学者非难,但与其谓为破坏汉文化,毋宁谓为统一中国政权后,并企图统一中国教权之较适当也。惟此统一事业,未及完成而中辍,其代之者为汉。汉虽大体袭用秦制,而恢复封建制度,使与郡县制度并行。当时分封各地之诸侯王,强大有势力,凌驾中央政府,于是汉之国家,政权上有统一之外形而无其实。又除秦挟书律,诸家学派再现于各地,主张自己学说,思想界亦缺乏统一之致。形势如此!敌国外患遂乘机来相侵陵,几有双方受压迫之势。当时威逼汉之国家者,为北方之匈奴与南方之南越。

◎ 匈奴南下之原因及其影响

◎ 封建问题之解决与思想界之统一

◎ 对匈奴问题之解决

先是汉民族建国于黄河流域时，北方之患在今长城一带，南方之患在今江淮流域。其后汉民族之国家，发展至于江南；南方之患，限于五岭以南，其祸稍舒，而北方之患，依然如旧。因五岭以南之地形，不似朔北之广漠奥衍，气候炎热，富于天然之食物，住民多土著而居，无冒险北侵之必要。朔北地势高燥、气候寒冷、土地斥卤、天惠缺乏、人民强悍、逐水草移徙，彼等南下一步，即有一步之利。每乘天高气清之秋，南下牧马，故当秦汉之交，北方之患，常较南方之患为大。秦筑万里长城以为国防，征发多数人民使为守备，诚属于事之不得已。而因是引起内乱，遂以亡秦。然则录图书中所载“亡秦者胡”一语，毋宁释为匈奴较适当也。秦亡以后，楚汉相争，汉民族无暇注意外事。匈奴乘机统一其部族，西走月氏，东灭东胡，复南下侵略中国北境。前汉统一中国后，不能不与北方之强敌匈奴对抗。汉高帝自将拒匈奴，被围于平城，不得已，用和亲政策，求一时苟安，固因汉室建国，为日犹浅，创痍未愈；抑亦因内部封建之诸侯王，割据各地，政权不能统一之所致也。职是之故，欲解决对匈奴问题，不得不先解决封建问题。吴楚七国之乱，虽一时海内动摇，然其镇定之结果，幸将封建问题解决。武帝施行推恩令，诸侯遂全成有名无实。于是政权统一，遂进而试行统一思想界。当时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诸家对峙，人心缺乏归一，武帝以最有历史的根据、便于统治国民的儒教，为政治道德之标准，以图统一思想界，于是汉民族之国家的统一逐渐完成。凭借此统一的大国家，试行解决匈奴问题，实为千载一时之好机会。武帝先征南方，灭南越、闽越、东瓯等国，以除后顾之忧，东取朝鲜、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通西域、遣使大月氏、结好乌孙，以断匈奴之右臂。更举大兵北伐，驱逐匈奴于漠北。坐是之故，财政紊乱，民心动摇，于是对匈奴问题，遂未能完全解决而中止。武帝崩后，霍光秉政，汉廷对外政策，暂取收缩方针，专图整理内政。会匈奴内乱起，诸酋分党相争，汉用抑强扶弱策，助呼韩邪，灭郅支，于是匈奴服从于汉。自汉兴以来，几经困难，未曾解决之对匈奴问题，至是遂完全告一结束。

◎ 佛教之输入与道教之成立

◎ 儒教学说及于时局之影响

◎ 清谈派学说及于时局之影响

外患绝灭，同时内乱发生，王莽以外戚篡主家，开以臣篡君之例，内政外交皆失败，

外民族悉背叛。后汉中兴,先整理内政,然后经略外民族,恢复西域,征服匈奴,汉民族之威灵,扩张到外蒙及中亚。当时汉与西域交通频繁,汉文化传至西方者固多,西方文化输入中国者亦不少,佛教由此时输入,其初无甚势力,后来汉民族逐渐流行信仰,影响及于汉文化者甚大。同时道家学说与方士之神仙说相合,造成道教基础,后更受佛教影响,渐具宗教的形势。儒教自前汉时,受国教的待遇,研究经学之风极盛,尚古思想与迷信风习相伴,信天人之间的关系,重阴阳五行,酿成谶纬说之流行。当时科学家虽发明地动说及地震器,而儒教解释经学,陷于训诂之末,选举孝廉,激成矫饰之风,一般人心流于形式,拘于外观,东汉末年号称气节之士之言动,实为当时思想界之反映。彼等屡与外戚宦官冲突,几招全灭之祸,因而内乱迭起,汉室卒为曹魏所篡,刘备、孙权起而抗之,于是变为三国鼎峙之形势,相持者约五十年,复为晋所统一。此时思想界,为后汉时代之反动,清谈之风盛行,崇拜老庄学说,好为放诞不羁之言行,不顾礼法名教,甚至有倡为无政府论者。此等放荡风俗,使当时社会从根本动摇,遂酿成八王之乱,终至引起五胡十六国之大乱。

◎ 民族之迁移与汉族文化之南下

自后汉以来,西北民族杂居于内地者甚多,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等诸民族,由中国北边,蔓延及于中国西边,彼等乘晋室内乱与社会之颓废,击破耽于清谈之汉民族,占领黄河流域,建立若干短命之帝国王国。汉民族奔避于江南,凭借长江流域立国,是为中国民族之大移转,汉文化普及于江南,亦由于此。自此以后,遂成南北两朝对立形势,南朝为汉民族所建,北朝为鲜卑民族所建。南北相争之际,南晋北为索虏,北晋南为岛夷。南北两朝俱怀抱统一中国之理想。南朝欲恢复北方,北朝欲并吞南方,双方冲突时常不绝。秦晋之战,汉民族胜,宋魏之战,鲜卑民族胜,齐魏之战,梁魏之战,相继而起,虽大体鲜卑民族战胜,然汉民族尚能保持对抗态度,卒未为鲜卑民族所兼并。及隋以汉民族起于北朝,终并吞南朝,混一字内。

◎ 南北文化之融合

汉民族久居长江流域,外民族久居黄河流域,南北之文化颇受影响。清谈之风传于南朝,北朝不行;骈体文学盛于南朝,北朝不振;儒教经传之注释,南北注意之点不同。惟佛教道教,南北俱盛行,则因当时社会昏乱,求安身立命于宗教之人甚多故也。儒教依然为注疏训诂之学,势甚不振。道佛两教之争颇烈,影响及于思想界者甚深。西域艺术随佛教

之流行以俱来,影响及于汉文化者亦不少。北方民族风俗输入,颇变更汉民族一部分旧风,例如汉民族旧尚右,至是改尚左,汉民族旧日席地坐卧,至是改用床椅,汉民族旧日着履与屐,至是改着靴鞋等,皆其例也。北朝风俗多风靡南朝,南朝文艺反压倒北朝,南北文化逐渐混合融化,遂产生出隋唐时代之新文化。

◎ 隋唐文化之特色

秦汉与隋唐之文化,相似之点甚多,绝对不同之点亦不少。隋唐文化大体系胚胎于南北朝时代者,学者不可不知也。唐代儒教经传之研究,虽多数不能轶出五经正义范围,而道教因受帝室崇拜,颇得势力,佛教则大乘各宗并立,高尚如天台宗、华严宗,缜密如禅宗、法相宗等,各发挥特色,有百花灿熳之观。文章虽未脱骅体余习,而诗学异常发达,书画雕刻之技艺,亦无不面目一新。然其间犹有古来一贯之汉文化的特色,依然继续存在,受此汉文化之洗礼者,无论何种民族,无一不受其支配,终至被同化于汉民族。北朝君臣,崇拜汉文化者甚多,彼等移居中国以后,用汉语、写汉字、编译儒教佛教经典,几与汉民族无异。是固由于外民族中无较优之文化,抑亦因鲜卑民族资质颖悟,与汉民族有同等之脑力故也。隋唐统一以后,南北民族,遂同时投入汉文化之熔矿炉中,不复留差异之迹。此等事实,后世其例甚多,此番为其嚆矢也。

◎ 隋唐之武功

◎ 安史之乱及于中国之影响

隋唐时代,为汉民族最隆盛之时代,其文化上之势力与政治上之势力,同时波及于周围各民族。先是南北朝时代,朝鲜半岛上,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鼎立,东与日本,西与中国大陆,关系时常不绝。当时蒙古境内,有鲜卑人创立之游牧帝国曰柔然者,通好南朝,屡侵北朝。及柔然衰亡,突厥勃兴,常威压北朝。隋唐时代,征服突厥,汉民族之威灵振于漠北。唐室与新罗结合,翦灭百济、高丽,驱逐半岛上日本之势力。而西方吐蕃勃兴,唐自力不能抗,乃北结回纥,西通大食,南招南诏,从三面牵掣之,虽其计划未能完全成功,然一时汉民族之势力,伸张到亚洲大半。安史之乱以后,内则宦官跋扈,挟制宫庭,外则藩镇专横,割据土地。后梁起于藩镇,翦除宦官,篡夺唐室,他藩镇尤而效之,各据地自王,变成五代十国之形势,互相争者五十年。中国内部分裂,汉民族无力统一,外民族契丹之势力,乘机由北方侵入。石晋与后唐争国,乞援于契丹,割燕云十六州以赂之,于是河北山西北部藩篱尽撤。代表汉民族之君主,欲攘契丹,不可不先统一中国。后周世宗、宋太祖、太宗之统

一计划,皆顺应时势者也。

◎ 宋代理学之发达及其及于政争之影响

有宋勃兴,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跋扈之祸,力行尚文之政治,其结果,汉文化虽异常发达,而文弱之弊益甚。北惧契丹之侵陵,西畏西夏之扰乱,不得不忍辱媾和。神宗用王安石,行新法,讲求富国强兵策,思欲对外雪耻,然其改革终归失败。是时宋之文化益发展,自唐以来久支配思想界之道佛二教,其本身虽势渐不振,而影响及于儒教方面,于是儒教哲学——即宋儒所谓“道学”——发生。濂——周濂溪——洛——程明道、伊川——关——张横渠——闽——朱晦庵——诸家,融化销纳道佛二教之思想,用以解释儒教经典,于是儒教呈复活之曙光,现出活泼有为之气势。彼等精于儒学,立一种宇宙观,抱一定之人生观,自信力太强,容易与第三者不相容,此风触及政治问题,遂成党争之远因。前有旧法派与新法派之争,后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,其原因虽甚复杂,然与学风颇有间接之关系。而其一胜一败,直接妨碍汉民族之统一,动摇国家之基础,甚可惜也。

◎ 宋室之南迁

是时女真民族勃兴于松花江流域,轻骑南下,侵略契丹边境。宋人以为有机可乘,与女真联盟,南北夹攻契丹,以图恢复燕云十六州。契丹既灭,女真仅与宋燕京及山前六州。又欺宋人文弱,背盟南侵,黄河之险不守,汴京陷落,徽钦二宗被虏,拘留于五国城,女真遂占领黄河流域。宋人奔避于江南,忍辱割地乞和,称臣纳贡,以求一时之苟安。虽时有倡为主战论者,轻启衅端,惹起南北之纷争,终不能成功而止。

◎ 蒙古民族之大一统

是时外蒙古不儿罕山麓,斡难河边,蒙古民族中,有一大英雄出现,即历史上著名之成吉思汗。先征服近邻同族,率漠北健儿南侵,略取女真北境。复大举西征,平定中亚诸国。又东旋,灭西夏,然后再大举侵女真,途中构疾,殁于六盘山,未及成功而歿。其子孙继其伟业,一时蒙古民族之意气,几有统一全世界之概。宋人不与女真联合,以当蒙古,反蹈从前覆辙,与蒙古同盟,击灭女真,一时虽稍有成功,不旋踵即与蒙古冲突,蒙古兵大举南下,宋之忠臣义士,声罪致讨,仗义勤王者虽多,然实力无一足与蒙古抗者,遂演成临安之

降服，崖山之没落，汉民族完全屈服于蒙古民族之下。宋之灿烂光华的文化，终不能救亡国之祸，可慨也！

◎ 契丹女真蒙古民族之汉化

由来契丹女真民族之文化程度，远不如汉民族，然犹各制国字，思以易汉字。其中若女真之世宗、章宗等，皆努力保存国粹，然终不能排除汉文化之势力，一未几皆被汉文化所侵蚀，同化于汉民族。蒙古民族建设空前之大帝国，包容许多民族，吸收东西文化，本不偏重汉文化，复欲使汉民族行使蒙古文字，然终不能发生效力，汉文化之伟大势力依然存在。蒙古人统治中国，不满百年，其间君位之争夺，宰相之专横，加以喇嘛之跋扈，财政之紊乱，遂致国本动摇，内乱迭起，为汉民族所驱逐，复奔回外蒙古，于是元亡明兴，汉文化复入于隆盛之运。

◎ 明代理学及于政局之影响

◎ 满洲民族之勃兴

通元明二代，宋代儒教哲学，支配当时上流社会之人心。其他各种文艺，虽非无足观者，然明代复古之气重，东林党受儒教哲学影响，尽瘁于无聊之三案争议。加以宦官跋扈，流寇扰乱，政局纷纠益甚。又自明初以来，北虏南倭，更迭骚扰，汉民族疲于奔命。其中有女真遗族之满州人，勃起于浑河流域，渡辽河、破长城、克燕京、下江南，击败文弱之汉民族，颠覆明之宗社，禹域山河全归爱新觉罗氏掌握，遂变为清朝时代。

◎ 满洲民族之汉化

清朝盛时，征服中国本部，平定蒙古、青海、西藏、新疆，建设统一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民族之大帝国。上有世祖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之英主，相继在位，一方面努力保存国粹，防被汉人同化，强制汉民族使从满洲风俗；一方面又为收揽人心计，内外百官参用满汉人物，奖励中国学术。清廷施行此等自相矛盾之政策，固出于不得已，然满洲民族终为汉文化之奴隶，完全被同化于汉民族。镇压汉人机关之满洲八旗，驻屯中国已久，尚武精神消失。形势如此，满洲朝廷之不能久有中国，固已为识者所共喻矣。

◎ 清代之学术

明代之儒教哲学,流于空理空论。清初,反动力起,考据之风盛行,经学之讲明,史学之研究,多倾向于考据。同时金石文字之学大兴,然尚不足以刺激汉民族之思想。中叶以后,春秋公羊学派出现,影响及于少数一部分之人心。佛教虽存,只余形式,道教只能支配下流社会。回教虽在一定之地方绰有势力,然中流以上之士大夫社会,概不流行。明末西人东渐,西方文化,若耶稣教,若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数学等各种科学,同时随之输入中国,然对于汉文化上,尚未能大有影响。因之汉民族一般之思想界,大体近于消沉。清朝犹赖历史上因循之惰力,得以统治中国。

◎ 鸦片之战及于中国之影响

◎ 湘军起义及于中国之影响

已而清廷因对英通商关系,惹起鸦片战争,连战连败之结果,订立南京条约,在清朝外交史上,留下第一次国耻纪念,是为西人之政治上的权力伸入中国之始。一方面损清朝之威严,一方面促汉民族之觉醒。未几,耶稣教徒洪杨作乱,创立太平天国,以颠覆清室为目的,同时并试行破坏汉文化,企图政治的兼社会的革命。曾国藩倡议湖南,率湘军、讨乱党,一方面为清廷效忠,一方面亦为汉民族拥护汉文化。及其大功告成,汉文化得以保存,汉民族之势力亦大行膨胀。以汉民族之力,平汉民族之乱,当时清室虽号为中兴,然清朝之死活,已归汉民族掌握中矣。已而清廷受俄人压迫,复与英、法、日本等国冲突,每战必败,徒损威灵,始觉国政有改革之必要,欲采泰西文化所长,补汉族文化所短。派遣多数学生,留学海外,吸收外国新文化。其结果使多数青年,发生民族的观念,增长政治的识见。武昌举义,满洲民族二百余年之社稷颠覆,于是以汉民族为中心,组织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,是为新来之泰西文化,影响及于汉文化者之一。此共和政体,果适于中国与否,虽为疑问,然民国成立已十余年,南北纷争犹未息,伟人、政客、军阀日从事于内讧。循此以往,中国之统一无期,汉民族之结合不固,周围外民族之势力,必重来压迫,可危也已!

◎ 中国历史上之外民族与当代外民族之比较

从来历史上压迫中国之外民族,武力虽优于汉民族,文化常劣于汉民族。故外民族虽

以武力征服中国,同时被中国文化所征服。而今何如也!今日压迫中国之外民族,非满族、非蒙族、非回族、藏族,乃文化与武力双方俱优越之欧美民族。此等诸民族,利用富强之实力,与海陆交通之便利,欧洲大战以后,同向东亚伸张势力。其首先受影响者,当为汉民族发祥地之中国本部,因而关于汉民族之前途与汉文化之将来,不得不发生许多悬念,汉文化存,则有汉民族,汉文化亡,则无汉民族。中国自有史以来,虽经过四千余年之变迁,几多民族之盛衰消长,然其国家依然有继续存在之观者,实以通古今各时代,犹有一贯之汉文化存在故也。然则为中国计,联络土地最接近之国,文化最类似之民族,互相扶助,以抵抗欧美诸民族,拥护本国民族,保持本国文化,岂非当代之急务?不此之图,而徒袭远交近攻之旧策,蹈宋联女真灭辽,联蒙古灭金之覆辙,他日一有变动,不但危及汉民族国家之独立,并影响及于汉文化之存灭。故为日本计,固当提倡中日亲善,即为中国计,亦何可不主张中日亲善也。

右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、文学博士市村瓊次郎先生所作之短篇论文,原名《支那历代史观》,以其文简单明了,可以通观中国历代之大势,译登于右,以代序文。

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

王桐龄自志

自序

历代各民族之盛衰兴亡

中国者，合六大族组织而成，中国之历史，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。此六大族中，现于中原者曰汉族，现于南方者曰苗族，现于东北方者曰通古斯族，现于正北方者曰蒙古族，现于西北方者曰突厥族，现于西方者曰西藏族。汉族以文化胜，他族以武力胜，他族以武力压倒汉族者，汉族以文化制服之。故每一竞争，而汉族势力一膨胀。其终也，他族自忘其为他族，相率融合于汉族之中，遂合多数人民，铸成今日庞大之中国。

◎ 汉苗之冲突

距今四千余年前，汉族滋生于黄河流域，以耕耘为业。同时有苗族者，据有扬子江流域，与之对抗。虞帝舜倦勤，大禹摄政，自将以征之，三旬弗克，是为汉族与苗族冲突时代。其终也，班师振旅，诞敷文德而苗降，顽梗者窜之三危，柔顺者留居故土。于是汉族势力一膨胀。

◎ 东夷南蛮之汉化

中国确史，始于春秋。春秋之时，汉族势力范围最狭，所谓中原者，不过河南全省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湖北一部分而已。环汉族周围而居者，曰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。东夷、南蛮，杂居于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等省，土著而居，以耕耘为业，其生活状态略如汉族。其后东夷并于齐，南蛮入于楚，汉族文化所及，东跨海，抵朝鲜，南达扬子江，迄五岭，旧时苗族领域，大半入汉族势力范围矣。